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

黄宝印 陈建伟

[摘要] 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精神,推动我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迈上新台阶,需要探索提升教育全球影响力的逻辑、机制与路径。以全球影响力生成要素为分析基础,追踪重要教育中心由单一资源集合体向多功能复合体演变历程发现,重要教育中心的全球影响力是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科技创新、制度规则和全球布局等五类模态涌现、增强与统合的非线性作用结果。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影响力竞争从早期的“单中心”演进为“一强多元”的格局,为新兴教育中心赢得全球影响力奠定了基础。我国具备多模态融合实现全球影响力跃升的独特优势,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需要积极实践新型世界教育观,高水平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加快原创性突破性创新,统筹做好人才引进与自主培养工作。

[关键词] 教育强国建设;重要教育中心;全球影响力;新型世界教育观

[作者简介] 黄宝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陈建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29)

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1]这为我国新时期不断提升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指明了方向。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到2027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2]研究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不仅是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从概念上具有源发性意义,是教育中心长期演化并在功能和影响力方面不断跃升的高级形态。从功能上看,前者在后者基础上实现了教育培训、知识创新和全球治理等功能的全球化拓展。从影响力上看,前者在后者基础上实现了从区域性影响力到全球性影响力的质变。实践中,全球化时代教育资源的国际流动催生了多样化的教育中心或教育枢纽,其表现形式也从早期的学生跨国境流动跃升为人才、知识和理念等方面的多层次交流。然而,不同教育中心的地位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且动态可变,教育资源投入规模庞大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全球影响力,关注

全球影响力的生成机制,才能更好地确定我国建设重要教育中心的方向和路径。

一、重要教育中心的 全球影响力性质与生成机制

从教育中心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教育体系的功能和影响力发生了质的飞跃。重要教育中心所具备的全球影响力并非单一要素的线性积累,而是多种因素协同互动的结果。

(一)全球影响力的多模态性质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经典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力的内涵通常包括主体间关系属性与行为因果性双重维度,其作用机制表现为施加影响的主体在行为模式、认知态度及价值取向层面塑造受影响客体的过程。^[3]换言之,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影响力资源本身,更取决于行为主体之间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互动的。从全球视角来看,全球影响力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实体在国际交往关系中影响其他国家或实体的行为、态度和决策的能力。^[4]因此,影响力的性质可以基于主体的各项影响力要素,及其在特定情境下对受影响主体决策过程及行为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来判断。

复杂互动关系中的影响力生成、表达与传递借助多模态视角能更全面地理解。模态是社会网络中参与主体用以互动交流和创造意义的各种资源集合,不同模态具有不同的表达潜力。^[5]现实社会网络中参与主体及其互动方式多样,单一模态在信息表达和意义生成方面存在局限,因而难以描述不同形式的沟通组合如何达到有效的信息传递。多模态视角可以通过整合分析多行为主体与多元信息模态,实现对复杂网络现象的全面理解,因而在教育学、政治学等多领域的研究应用中日益受到重视。多模态框架可以将抽象的教育过程及目标可视化和量化,使教育能像

产品生产一样被衡量质量和评估表现。^[6]多模态分析强调不同模态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例如,在课堂教学行为分析中,教师行为需要通过讲授、演示、互动、设备操作、课堂监管等多种行为要素进行分析,要综合采集视频、语音、文本等数据类型。^[7]

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不断扩展到新兴的交叉学科、前沿科技、全球性挑战等更广阔的复杂互动领域,这意味着其全球影响力的生成、传递与作用系统具备多模态属性。首先,影响力生成网络的参与主体及其互动方式是多样的,包括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际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各种模态(留学、线上线下交流、项目合作)实现连接与互动。其次,影响力通过多种不同模式和渠道传递,可能包括人才的流动、知识的传播、文化的交流与政策的倡导等。再次,影响力辐射范围从区域本土化显著扩展至全球,深度融入全球人才培养、知识生产格局。这意味着,重要教育中心的全球影响力不是任何单一要素的贡献,而是多元要素在多元网络系统中动态融合的结果。

(二)全球影响力的构成要素分解

重要教育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可能涉及不同类型影响力资源的积累、转化和全球辐射,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生成的双边或多边互动关系。这些模态通过互动、共生、竞争等关系构建影响力网络。分解全球影响力的构成要素,将为进一步阐释其生成机制提供基础。借助多模态视角,将全球影响力的构成要素分解为以下五种。

一是经济实力。这是生成全球影响力的物质基础,根植于教育中心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如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拨款、科研经费、校友捐赠以及教育机构的学费收入等。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为配备一流教育基础设施和构建知识传播平台提供支撑,能提供优厚待遇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并形成人

才高地,也能助推设立国际政策对话平台并推广教育理念,从而通过知识传播、人才流动和全球政策协调提升全球影响力。当然,经济实力与全球影响力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正相关,人才、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对于放大经济实力模态的影响力非常重要。

二是文化软实力。这是生成全球影响力的深厚底蕴,根植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学术范式、思想理念和话语体系。相比于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产生的国际影响力更为持久和广泛,因为软实力更容易得到深层次的文化认同。^[8]文化软实力以文化吸引力和教育体系声誉塑造全球认同,通过语言文化和学术范式搭建知识传播桥梁,通过文化体验和多元环境提升教育吸引力,通过文化网络连接全球人才,通过文化认同增强人才凝聚力,通过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催生突破性创新。此外,文化软实力能够支撑国际话语权和道义影响力,通过传播价值理念提升全球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效果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积累和释放。

三是科技创新。这是生成全球影响力的动力源泉,根植于教育中心的科研能力、技术网络、技术转化机制和创新生态系统,旨在通过科技创新和全球性知识溢出驱动全球影响力跃升。科技创新驱动教育中心以前沿成果引领科技创新方向,以技术转移平台网络加速知识扩散,以一流平台和创新机制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以产业聚集和技术生态促进人才开发与流动。数字化技术网络(如在线教育平台、科研数据库)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教育资源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并提升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此外,居于科技前沿领先地位的教育中心拥有全球科技治理话语权,能够以前瞻性科技政策和伦理思考引领全球科技发展,并主导国际科技标准制定,实现科技影响力最大化。

四是制度规则。这是生成全球影响力的

秩序基石,根植于教育中心内部的现代治理体系与卓越制度文化,由旨在规范和引导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活动的一系列规则、标准、协议和机制组成,具体涵盖了教育体系制度、科研管理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国际合作机制等多个层面,如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教育质量认证体系等。这一类模态影响着教育的互通、质量、公信力和国际合作,良好的规则制度可以提升教育中心的声誉和吸引力,从而增强其全球影响力。而在全球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或地区,更有能力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教育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影响力。

五是全球布局。这是实现全球影响力有效投射和持续扩展的战略平台,根植于教育中心所拥有的区位优势、环境吸引力与空间组织能力。具体而言,全球布局模态涵盖了教育中心在全球地理空间上的战略部署和功能配置,如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在的城市环境、精心规划的校园布局、前瞻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统筹和优化全球范围的资源布局,构建有利于知识创新、人才汇聚和国际交流的优质空间载体,教育中心能够确立在全球教育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和环境吸引力。同样地,全球布局和资源配置需要结合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因素才能更好提升影响力。

(三)全球影响力的非线性生成机制

全球影响力并非由各类模态要素简单叠加而成,而是在多种模态相互作用下非线性生成的。具备多模态特征仅仅是教育中心构建和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要将潜在影响力转化为现实影响力,仍需要通过有效的生成机制,以核心价值理念为引领,充分发挥各类模态的潜力。具体有以下三类多模态全球影响力的非线性生成机制。

一是模态协同的涌现效应。重要教育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并非前述五类模态各自影响力的简单线性汇总,而是各模态要素之间发

生深刻互动、深度融合后产生的一种超越线性叠加的涌现效应。这种涌现性体现了多模态框架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意味着重要教育中心的整体影响力要远大于各模态独立作用的简单累加。例如,顶尖大学城往往处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教育和研发的空间集聚不仅为科研活动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还能够激发区域内的知识交流和创新氛围,产生远超经济投入和全球布局独立作用的影响力效果。因此,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并非单点突破,需要系统性的整体优化和协同发展。

二是动态循环的增强效应。多模态全球影响力的生成与传播并非单向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由各模态动态反馈与自组织机制驱动的循环增强系统。各类模态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动态演化,形成复杂的反馈循环。例如,经济实力作为物质基础,为文化软实力、科技创新和全球布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源保障,文化软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又能够显著增强教育中心的全球吸引力和学术声誉,进一步放大经济实力的杠杆效应,形成以经济促文化科技和文化科技反哺经济的良性循环。这种动态循环的增强机制,使教育中心的全球影响力能够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螺旋式上升,并最终形成强大的全球影响力优势。

三是价值理念的统合效应。价值理念如同多模态系统的“指挥棒”,它超越了单一模态的局限,将复杂系统的不同模态力量统合起来,形成目标一致、协同高效的有机整体。有效的价值塑造能够为多模态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提供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确保多模态系统能够围绕共同的价值目标协同发力,从而更有效地将多模态潜力转化为现实影响力。例如,一个秉持开放、包容和创新等价值理念的教育中心,更有可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和资源,从而促进其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并借助实践成果进

一步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二、重要教育中心的 全球演进历程与影响力竞争格局

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教育中心演进历程,是一部从早期侧重单一模态优势积累,转向如今多模态协同竞争的动态历史。早期博洛尼亚大学依托文化软实力与制度规则奠定了影响力基础,其后柏林洪堡大学以研究型大学模式引领知识创新与科技前沿突破,及至美国凭借综合实力崛起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进入新时代,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已演进至多模态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的“一强多元”格局。未来重要教育中心的竞争将愈发取决于其在多模态协同创新方面的能力。

(一)博洛尼亚大学与欧洲教育中心兴起的历史溯源

探寻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早期起源可以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开始,因为现代大学的雏形和学生跨国界流动可追溯至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以博洛尼亚大学为起点形成的早期教育中心,是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和制度规则结合的重要典范,为后续教育中心影响力在欧洲扩散并崛起为欧洲的教育中心奠定了基础。

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成立,意大利逐渐跃升为中世纪欧洲的教育中心,持续吸引欧洲各地的学生和学者,形成了早期的跨国影响力。基于多模态全球影响力视角,这与博洛尼亚大学依托城市经济实力(自治城市提供经济支持)、倡导先进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主)、实施行会制度和大学自治章程(制度规则)密不可分。此外,博洛尼亚大学还设置了学位证书制度和严谨的学术要求,显著提升了其毕业生在社会阶层流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尤为重要的是,由毕业生向欧洲乃至更广阔地域流动而形成的庞大社会网络,进一步增强了意大利教育的国际吸引力。

博洛尼亚的开放性吸引了其他城市竞相效仿,新式大学机构陆续成立,包括帕多瓦大学(1222年)、那不勒斯大学(1224年)、罗马大学(1343年)、佛罗伦萨大学(1321年)。^[9]这些大学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强大教育资源网络,意大利因此也可以培养更多的国际学生。数据显示,1500年前后,全欧洲的大学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意大利,其次是法国、西班牙和德国。^[10]全新的教育理念、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庞大的教育规模,推动意大利成为早期欧洲的教育中心,为演进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准备了历史条件。

(二)柏林洪堡大学与重要教育中心的多元演进

工业革命开启了由经济实力、科技、制度规则等多模态驱动的欧洲教育中心多元演进历程。英国、德国和法国建立起享誉全球的高等教育体系,^[11]这也推动英国、法国和德国发展成为重要教育中心。

中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为欧洲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后续的教育理念和范式变革提供了土壤。此后,工业革命又加速了欧洲教育体系的理念和范式变革。其教育理念从注重知识传授转向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重,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和创造能力;教育范式从古典精英教育向大众实用教育转变,从封闭单一教育向开放多元教育转变;教育制度的创新发展层出不穷,义务教育制度、教育财政拨款制度等现代教育制度先后确立。尤其是德国洪堡大学,通过改革大学制度、强调研究导向,营造了有利于知识创新和人才涌现的学术生态。这种价值理念引领下的制度创新,犹如多模态系统中的催化剂。德国的教育模式不断影响其他国家,形成了全球影响力的持续输出。

德国洪堡大学模式带来的影响力提升在欧洲并非特例。在英国,工业革命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为英国教育体系的转型和科技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了科学、工程等学科的兴起和教育范式的变革;皇家学会等科研机构的成立,促进了科学知识的积累并提升了学术声誉;近代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和贸易网络,使英国有强大的全球布局能力,能够将其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类似地,工业革命扩散到法国后,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海外殖民地扩张为法国教育影响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法国具有悠久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通过建立高等师范学院和综合理工学院等精英学府,培养了一批批具有深厚学术功底和卓越科研能力的杰出人才。多模态相互作用促进变革,共同生成了强大的教育影响力,最终确立了英国、法国等国发展成为新型的重要教育中心。

(三)美国教育的崛起与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扩大

美国的教育崛起与全球影响力扩大要追溯到19世纪前后。19世纪中后期,美国在借鉴和转化欧洲先进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的基础上,^[12]结合自身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形成了兼具实用性与多元包容性的特色化教育模式。进入20世纪,世界经济和科技中心逐渐向美国转移,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成为新兴世界教育中心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科研资源,迅速提升其大学的科研水平和国际声誉,一跃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在战略行动方面,美国综合运用签证政策、奖学金项目等方式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留学生,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始终坚持着服务国家战略的理念,^[13]体现了制度规则模态的战略性运用。在教学科研方面,美国联邦政府的科学政策与财政投入在推动美国大学加强科研、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并非依靠单一模态的优势,而是多种

模态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综合结果。首先,美国大学通过与高科技产业界的紧密合作构建技术网络,叠加其强调创新和创业的教育文化,对全球学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其次,美国大学通过建立标准化的学位体系和质量评估体系等制度规则,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再次,美国自20世纪中叶开始大幅扩大博士生招生和培养规模,在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通过毕业生将美国的教育理念、科研方法和创新精神传递到生源地,进而巩固了美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此外,美国大学还基于全球战略,在海外设立分校、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其全球影响力。

(四)重要教育中心的“一强多元”格局

从全球演进历程看,重要教育中心基本是自演进与主动塑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全球影响力的生成机制具有多模态属性,教育、人才和知识交流网络必然表现出多中心特征,这意味着多中心模式也是重要教育中心全球影响力动态竞争必然指向的结果。多模态通过分散资源、促进功能分化和推动网络化互动,削弱了单一中心的垄断能力,同时为新兴中心提供了崛起的机会。这种多模态竞争机制不仅反映了全球范围内重要教育中心的多样性,也预示着未来的重要教育中心竞争格局将由多个中心共同塑造。换言之,多模态属性是多中心格局形成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分布呈现“一强多元”的格局。美国凭借其在多模态全球影响力生成过程中的综合优势,稳居全球教育体系的中心地位,占据了全球格局中的“一强”地位。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依托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发展模式,在特定领域或特定区域展现出特色的全球影响力,形成了“多元”影响力竞争的局面。

展望未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

中心“一强多元”格局仍将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稳定,但是全球影响力的模态重构可能会冲击这一格局。原因在于,重要教育中心的全球影响力都需要借助特定的模态实现,而模态重构趋势将改变影响力的传播路径和力量对比,这可能会打破原有影响力格局,催生新的影响力传递路径。保持全球影响力的多模态性质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全球经济实力相对消长、颠覆型技术进展、制度规则竞争等因素,都有可能引发全球影响力重构与新兴重要教育中心的崛起。

三、我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独特优势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新兴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交汇作用下,驱动区域的教育中心迈向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引擎,正从单一的教育资源集合转向多元涌现、联动增强的多模态影响力作用系统。而我国的超大规模体量、深厚文化底蕴、复杂技术结构、制度型对外开放以及全球布局策略与这一影响力作用系统高度契合,在经济实力、文化软实力、科技创新前沿等方面不断发展出新的优势,为拓宽全球影响力的资源边界与覆盖范围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一)经济实力支撑扩大全球影响力

经济实力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基石。我国的经济实力优势不仅在于持续增长的体量,更在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体系完备的工业体系形成了相互支撑,为建设功能更加多元、辐射范围更广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超大规模市场来看,我国的庞大内需驱动力提供了教育发展的独特基础。全球其他新兴经济体多数不具备我国的人口体量,而传统发达国家则面临人口结构老化和内需市场增长放缓的挑战。我国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对国内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各层次教育培训的需求较大,这为各类教育形态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学历教育到职业技能培训,各领域都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升级,也有助于吸引全球优质教育资源涌入我国,加速全球教育枢纽的形成。

从最全工业体系来看,我国的产业链韧性和外向连接性为建设重要教育中心拓展了全球舞台。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完备的工业体系意味着我国需要培养和吸引覆盖所有产业门类的专业人才,这驱动我国教育体系培养支撑全门类学科发展的能力。这种全门类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体系,使我国能够作为全球新兴的重要教育中心满足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样化教育需求。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极其密切。这种高强度的国际经贸交流,为我国教育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文化魅力增强全球吸引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底蕴和独特品性,为我国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大特性,赋予我国教育体系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我国教育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例如,传承上千年的儒家思想、道家哲学、传统医学、中华文学艺术等都是我国独有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能够为全球学生提供独特的学习体验。

我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一直以来,我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以教育对外交流

和文明互鉴为渠道,超越文明隔阂和冲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理念使我国教育在国际舞台上具备了鲜明的理念标识,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注入了持续的价值引领。例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和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促进了共建国家的学术合作与知识流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多方成效,对外人文交流不断深化。^[14]这种对外交流和传播影响力的增强效应,使我国的教育影响力从区域向全球范围延伸,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搭建教育与文化沟通的桥梁,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全球教育和知识网络中的枢纽角色。

(三)科技创新助力抢占未来教育发展制高点

科技创新和应用驱动教育范式变革,构建起新型教育范式。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在线课程、虚拟现实学习、移动应用程序、教育软件以及其他使用技术来增强和转变教学体验的方式,构建起迥异于传统教育范式的规模化、智能化的新型教育模式。规模化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低成本复制与传播,智能化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教育模式难以满足大众化教育需求的瓶颈。例如,我国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覆盖近3亿学生和1800多万教师,其全球领先的资源规模和服务能力为构建强大的全球化知识交流网络创造了技术条件,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规模化和数字化教育供给模式上的独特优势。

技术赋能使我国教育体系从传统的单一教育资源引入和输出模式,逐步转型为以技术驱动的前沿创新知识生产和以文化为底蕴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模式。由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多层次知识交流和教育互动超越了传统教育对外开放的线性发展逻辑,不仅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知识传播模式的深

刻变革,更在全球教育竞争中为我国抢占制高点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我国教育体系的全球吸引力,也为全球教育生态注入了协同创新与包容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了全球教育体系和重要教育中心竞争格局向更加多元的方向演进。

(四)制度型开放推动我国教育制度与规则标准影响全球

我国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通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制度框架体系,为我国教育体系融入全球知识共同体并发挥新的重要枢纽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球教育模式转型的背景下,我国通过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搭建与国际高标准教育体系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逐渐完善涉外教育治理、提升管理效能,还建立了符合国际惯例的教育质量认证机制,使我国教育在制度化与规范化上迈上新台阶。这种整体性提升超越了单一制度的简单叠加并形成了涌现效应,显著增强了我国教育体系质量的全球认可度。此外,与倾向于限制开放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依托制度型开放和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释放的吸引力,为教育制度规则走向全球提供了稳固支撑。

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通过推动教育资源与人才的全球流动,进一步助力我国牢牢掌握建设重要教育中心的战略主动。通过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推动学历学位互认、建立灵活的合作办学模式和创新人才跨境交流机制,极大地优化了国内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全球化配置。这种资源整合形成了统合效应,使我国教育体系在全球网络中占据枢纽地位,同时通过增强效应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例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的教育合作协议,不仅方便学生流动,还推动了我国教育标准的输出,显著提高了全球影响力。此外,深度参与国际教育治理,不仅有助于降低跨文化合作的制度成本,还能在规则制定中融入自身需求,从而在多模态影

响力的涌现系统中占据先机,为教育制度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提供持续动能。

(五)全球布局策略构建更具活力的全球影响力网络

全球布局通过多模态合作网络的涌现效应,为我国迈向重要教育中心行列注入强劲动能。在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过程中,我国逐渐构建起跨洲域的多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体系。这一体系通过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和海外校区建设,同时借助在线教育平台,将优质资源辐射至全球。例如,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在非洲设立教育机构,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技能型人才培养能力,还通过文化交流与产业转移加强了我国在全球教育网络中的枢纽地位。这种网络化布局催生了涌现效应,使教育影响力从特定区域稳步扩散至全球。

全球布局通过人才流动与资源整合的统合效应,重塑了我国教育体系在全球治理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与话语能力。我国通过跨国布局打造全球人才流动和配置网络,促进人才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这一网络的统合效应显著提升了我国建设重要教育中心的全球吸引力。例如,我国长期实施的“留学中国”计划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来华学习,同时,我国还有计划地引进海外人才、汇聚全球顶尖学者,形成人才集聚的正向循环。这种人才网络整合能力不仅源自我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优势和科技创新的前沿地位,还得益于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合作中逐渐赢得的信任与认同。我国得以在全球治理中不断发挥更大作用。

四、我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主要路径

基于我国现阶段各方面的独特优势,探索我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之可行路径,需要积极实践新型世界教育观,引领影响力多模态要素协同并进助力全球影

响力跃升;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有效提升我国教育影响力的全球辐射;加快科学技术的原创性与突破性创新,在全球知识创新体系中贡献中国智慧;统筹兼顾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与全球延揽,壮大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人才队伍。

(一)积极实践新型世界教育观

建设重要教育中心是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也是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过程。我国在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的新型世界教育观,为全球影响力提升提供了文化支撑。新型世界教育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适应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教育导向和实践框架,倡导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教育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渠道,强调教育在促进知识创新、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增进文化理解、实现全球共同目标以及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知识传播、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的全过程中积极塑造新型世界教育观,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实践要点。

一是与时俱进更新国际教育办学理念。综观重要教育中心的崛起和演进历程,不断根据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调整办学理念,是适应时代发展节奏并汇聚世界人才的关键。尤其是国际教育领域,需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培养学生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基于新型世界教育观,我国的国际化教育需要着重更新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具备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新型人才,以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鼓励创新和利用数字化工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动力;倡导通过教育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消除文化隔阂,以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尊重与包容。

二是注重发挥教育机构和师资力量作用。众多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以及民间协会组织,在新型世界教育观的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各类教育机构和研究协会积极开展跨国联合研究、国际学员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促进我国新时代教育理念的更新、推广与全球扩散,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与此同时,还须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强对教师的国际视野拓展和跨文化教学沟通能力培养,确保其能够成为新型世界教育观的积极践行者和有效传播者。要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以鼓励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研究项目和海外教学实践,支持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入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教育观,从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人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二)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需要统筹教育“走出去”和“引进来”,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在参与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提升我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

一是建立多层次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推动国际政府间和教育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层面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教育规则与标准制定等方式,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教育机构层面应积极与国外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建立深度专业的合作关系,开展高质量联合办学、学术交流、师生互访等项目。此外,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要主动加强教育理念交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和传播好中国教育声音,以教育理念为纽带促进民心相向。

二是更好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教育,面向全球共享中国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数字

技术有助于打破地域和地理范围限制,提高教育供给效率和优质资源可及性,从而不断缩小教育差距。加强开发多语言在线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让更多国际学生能够获取中国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从而增强对中国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文化的认同。要探索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开展国际学生的虚拟交流活动,增进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三是丰富和优化国际教育援助项目,更好发挥“走出去”的示范效应。要主动“走出去”分享中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教育合作提供多样化更具针对性的项目选择,以此提升教育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发挥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优势和特长,更好利用“鲁班工坊”等项目,扩大中国教育的影响力,更有成效地参与、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完善教育对外援助项目设置,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和师资人才帮助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克服教育赤字、提升教育质量。

四是有效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更好发挥“引进来”的纽带作用。完善的制度体系是“留学中国”品牌建设的基础。应着力构建全面的法规制度体系,涵盖来华留学的招生、医疗保障、教学管理、服务支持等各方面。以优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吸引力,进而增强国际学生对中国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强化教育质量评估是“留学中国”品牌建设的关键。推动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通过设立质量标准、评估机制和认证体系,确保提供来华留学教育的机构和课程保持高标准。教育文化交流协同开展是“留学中国”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资助和组织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交流项目和研讨会,促进中外学生之间的文化互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持。

(三)加快科学技术的原创性突破性创新

原创性创新是可能引领新研究方向和带来颠覆性变革的创新。能否取得原创性科技成果,是重要教育中心能否产生持久、广泛的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既能转化为经济实力,又能强化文化软实力。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支持加快科学技术的原创性突破性创新,助力中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一是构建多层次和多渠道的科研资金投入机制,确保原创性研究获得充足且灵活的资源支持。要加大国家级原创性研究专项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具有潜在颠覆性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和项目。要通过税收优惠和风险投资等方式,合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原创性研究领域,鼓励广大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科研资金投入。要持续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审批流程,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是营造与国际高标准对标的开放包容科研生态,激发颠覆性创新活力。要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高等教育资源聚集区,率先营造开放、包容和高效的科研环境氛围,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要建立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注重原创性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技术转移转化机制,鼓励科研成果快速转入商业化应用。要推动科研数据和科研资源的开放共享,建立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合作平台,以促进知识的交流和碰撞。

三是前瞻布局高水平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建设,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全球学术影响力。要聚焦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其全球性的研究价值,吸引全球科研人员深入探索并研究传播中国经验。要加大力度建设国际性学术会议平台,积极吸引和支持国际顶尖学者参与在我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要支持创办和资助一批

高水平英文学术期刊,聚焦中国优势和特色研究领域,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学术引领力。通过持续推动国内科研交流的国际化,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全球学术版图中的显示度和话语权,为提升我国教育全球影响力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四)统筹做好创新人才引进与自主培养

历史经验表明,顶尖科学家在重要教育中心的崛起和演进过程中能够发挥“临门一脚”的重要作用,其创新研究能推动重大原创性科学技术的突破。因此,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必须统筹做好人才引进和自主培养工作。在薪酬、科研经费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要制定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政策,优化人才引进审批流程和提高引才效率,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本土人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一是要实施更具全球竞争力的顶尖人才“精准引育”战略,打造集聚全球智慧的战略人才高地。要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科研启动经费和社会保障条件吸引顶尖人才,同时更加注重提供与引进人才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相匹配的科研平台、发展空间和制度环境。要进一步优化国际人才引进审批流程,构建以科研院所为平台、以信任为基础、以服务为核心的人才发展生态,吸引一批引领国际学术前沿、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顶尖人才全职来华创新创业,充分发挥其“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快速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力。

二是要构建多层次贯通融合的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夯实支撑教育、科技发展的战略人才储备机制。要基于前瞻布局构建从基础研究人才、卓越工程师到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的多层次、多类型贯通融合的立体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要进一步强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着力提升本土人才的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技术攻关能力和交叉学科融合能力,以

夯实支撑突破性创新的战略人才储备和人才雁阵格局。

三是要创设更富活力的本土人才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加速提升自主培养人才的国际学术竞争力和影响力。应打破本土人才发展的地域和体制壁垒,创设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本土人才参与国际科研合作交流机制;要加大专项基金支持力度,系统性资助本土人才开展长期海外访学、国际合作研究和参与国际学术组织;鼓励和支持本土人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升本土人才的全球影响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重要抓手,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15]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强化使命担当,增强开放能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 求是, 2023, (18).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 人民日报, 2025-01-20.
- [3] Parsons, T. On the Concept of Influence[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3, (1).
- [4] Meierding, E., Sigman, 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J].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21, (4).
- [5] Jewitt, C., et al. *Introducing Multimodali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71.
- [6] Ledin, P., Machin, D. *Introduction to Multimodal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0. 25.
- [7] 张乐乐, 顾小清. 多模态数据支持的课堂教学行为分析模型与实践框架[J]. *开放教育研究*, 2022, (6).
- [8] Nye, J. S. Soft Power [J]. *Foreign Policy*, 1990, (80).
- [9] De la Croix, D., Vitale, M. A Timeline of Medieval Universities [J]. *Repertorium Eruditorum Totius Europae*, 2022, (8).
- [10] De la Croix, D., et al. The Academic Market and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1000—1800)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4, (4).
- [11] Rüegg, W. Themes [A] Rüegg, W.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ume III,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1800—1945)[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20.

[12] 王晨,徐小雲.美国在世界教育中心转移过程中的早期努力——以美国裴斯泰洛齐运动为例[J].外国教育研究,2023,(10).

[13] 石毅.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家战略[J].教育研究,

2020,(9).

[14] 秦惠民,王名扬.“一带一路”十周年: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成效与新格局[J].中国高等教育,2023,(20).

[15] 黄宝印,秦冠英.深刻把握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战略要求[N].光明日报,2024-05-28.

Building an Important Education Center with a Global Influenc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Practice-Based Pathways

Huang Baoyin & Chen Jianwei

Abstract: To practice the spirit of the *Outline of China's National Plan for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2024-2035)* to step up our pace of making China an important education center with a global influence, we need to explore the logic,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to increase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in educ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for global influence, and a trace of the evolution of important education centers from a single resource aggregation to a multi-functional complex, finds that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an important education center results from the non-linear effects of emergence, enhancement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modes of economic strength, cultural soft pow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rules, and global layout.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influence in important world education centers has evolved from a pattern of an early "single center" to that of "one powerful center and several distinctive ones," which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ing education centers to win a global influence. China has a unique advantage of gaining a greater global influence through multi-modal integration. To build an important education center with a global influence, we need to actively practice a new concept of world education, promote opening-up education at a higher level, accelerate the original and breakthrough-based innovations, and coordin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and the independent cultivation of talents.

Key words: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important world education center; global influence; a new concept of world education

Authors: Huang Baoyin, Secretary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nd Dean and senior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World Influential Educ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en Jianwei, senior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World Influential Educ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责任编辑:陈 枫]